

以文明对话新范式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王学典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地缘冲突加剧、信任赤字加深、发展失衡突出等多重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刻。这些困境不仅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结构矛盾,也与文明间的隔阂、误解与对抗性思维有着密切联系。文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又该走向何方,已经成为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紧迫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这一重要论述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指明了路径。

反思和扬弃冷战结束以来的文明叙事

审视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危机,必须对冷战结束以来深刻影响国际思潮的几种文明叙事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和扬弃。

比如,所谓“历史终结论”曾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奉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唯一终点,这是冷战终结这一特定历史节点与“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相结合的产物。然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和西方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这一论调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许多西方学者不得不进行反思,直面西方政治秩序的现实困境,重新审视其他文明的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坚守马克思主义魂魄,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鲜活事实证明了文明演进路径的多样性与制度选择的多元性,更从根本上证伪了“历史终结论”。

与“历史终结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单线史观不同,所谓“文明冲突论”尽管承认文明差异,却以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视角将文明多样性扭曲为对抗性,暴露了西方主流思潮在“非西方崛起”时的焦虑心理与零和思维。同时,我们更须清醒认识到,“文明冲突论”其实是个伪命题,冲突并非由不同文明本身所导致。事实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所谓的“文明冲突”,大都属于地缘政治集团的利益冲突,是西方大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将地缘对抗意识形态化的结果。这种对抗叙事非但无助于解决纷争,反而将人类陷入文明对立的宿命论悲观情绪,加剧国际社会的安全与信任危机。

在对上述思潮的扬弃中,有国外学者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认知误区,提出“多元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文明可以有基于不同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的非西方路径,承认并尊重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主体性与独特探索。然而,如果缺少共同价值的引领,当不同现代性方案背后承载着不同

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核心利益时,多元之间可能会引发竞争失序甚至失控,与人类美好愿景背道而驰。因此,“多元现代性”理论虽然指出了“多”的存在,但未能有效解决“多”如何相处、如何从“多元并存”走向“和而不同”的难题。

面对“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系统构成了应对全球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立足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理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治理构建文明对话新范式,将多元文明从被动承认转向主动共建,从价值共识、发展路径与治理模式上提供了系统性方案,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

从文明的二重属性领悟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在四大全球倡议中,全球文明倡议居于独特而基础的地位。习近平主席指出:“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发展注入互利共赢的合作温度,为全球安全注入相互尊重的对话理性,为全球治理注入和而不同的价值共识,是破解深层隔阂、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基石的深层次动力。

深刻理解全球文明倡议,需要引入文明二重属性的理论视角。任何文明都同时具备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时间属性即时代性,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连;空间属性即民族性,植根于特定地域的地理环境、历史实践与人文传统,决定了不同文明对秩序、正义、伦理的独特理解与价值追求,构成了文明多样性的坚实基础。

工业革命以降,西方近代文明凭借在生产力上的优势实现了全球化扩张,并一度将自身发展模式与价值标准强加于世界,使得近代以来全球治理体系深深烙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印记。这一过程固然彰显了文明时间属性的客观力量,但也暴露了其片面化、绝对化,并用以压制甚至否定其他文明空间属性的霸权逻辑。在漫长的“被动现代化”历程中,非西方文明经历了深刻觉醒,开始反思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的严重失衡,并愈发自觉地探索符合自身文明特质、维护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发展与治理路径。这一集体性觉醒正在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从少数国家单向主导,向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向演进,对文明时间属性的扭曲解读得到历史性修正。

中华文明是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蕴含着“和合共生”“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等深邃理念,深刻体现了对文明空间属性即文明多样性的高度尊重与包容智慧。“中外一体”“四海一家”的天下观,超越了狭隘民族与国家界限,倡导一种基于文化认同与道义感召的秩序构想,这与文明空间属性内在要求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高度契合,为思考和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极为

宝贵的东方智慧。

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在汲取中华文明智慧基础上对文明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辩证统一进行了科学把握。它承认不同文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鼓励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吸纳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顺应历史潮流;同时,它坚决反对以时间属性为借口,否定或压制文明的空间属性,主张各国必须在传承自身文明特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实现“旧邦新命”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倡议既回应了人类社会共同迈向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又守护着不同文明的精神家园与独特价值,为从根本上破解文明隔阂、凝聚全球治理共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遵循与行动指南。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为全球治理注入人文力量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其思想根基在于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与误解的根本途径。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关键是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做深做实,为民心相通厚植文化沃土,为全球治理注入人文力量。

强化人文学术的思想引领作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深入提炼中国经验,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鼓励和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清晰阐释中国之治的深厚文明根基,讲清楚中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与精神价值。积极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不同文明间的深度思想对话,践行和而不同的互鉴路径,推动全球知识体系向着更加多元平衡的方向重构,为全球治理的学理创新提供坚实支撑。

着力构建多元、立体、高效的文明对话平台。加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建设,打造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国际化学术交流品牌。持续深化和拓展高端对话机制,积极推进国际学者来华驻研访学等长期性合作项目,为不同文明背景的各界精英、有识之士提供深度思想碰撞的制度化空间。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发展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交流产品,通过科技赋能实现文明价值的场景化感知与传播,提升文明对话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推动文明对话从学术探讨、思想交流的理论维度,向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实践维度延伸。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生态保护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领域,创设文明对话机制,有机融入不同文明的治理智慧与伦理思考,使全球治理方案能够汲取全人类的智慧结晶,朝着更加科学、公正、包容、有效的方向发展。

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全球文明倡议并非一个孤立的对文明愿景的宣示,而是与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相互支撑、有机衔接,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系统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共同构成了面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体目标的完整思想体系与行动框架。

四大全球倡议深深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了中华文明“责任为先、集体至上、和合共生”的伦理基因,突破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单一模板,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与智慧方略的国际表达,即立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将中华文明积淀的治理智慧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转化为能够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可借鉴的公共产品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的巨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四大全球倡议所蕴含理念的科学与可行性,为在全球范围落地生根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实践案例,彰显了中国方案的现实生命力与道义感召力。

四大全球倡议从理念、主体与机制三个维度为系统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奠定基石。在理念上,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将发展权、安全权、文明多样性纳入治理核心议程,重塑了治理的公正性与包容性;打破意识形态壁垒,以共同发展超越零和博弈,推动国际关系从传统的阵营对抗逻辑向崭新的合作共赢范式转型。在主体上,打破大国垄断,倡导并推动在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议程设置中,充分吸纳非西方文明的治理智慧与实践经验,使规则制定更具代表性平衡性,推动全球治理迈向“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新范式。在机制上,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将倡议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如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型治理机构,为全球治理提出了灵活、务实、多元的实践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硬联通”促进不同文明地域的物理连接,通过规则标准“软联通”推动治理理念的相互借鉴,更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实现同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为在全球范围落实倡议精神提供了先行示范。

习近平主席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竭动力。”要推动将四大全球倡议从理念转化为系统性行动,以全球治理构建文明对话新范式,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共同发展凝聚合作共识,以共同发展为安全互信提供物质支撑,以安全互信为文明对话创造和平环境,以文明对话为治理共识注入文化根基。这种有机联动,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贯穿四大全球倡议的现实纽带,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从价值认同延伸到实践协同。面对全球治理的严峻挑战,我们应当勇担历史责任,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国际社会摒弃傲慢与偏见,超越零和博弈与对抗,以平等尊重的心态看待彼此,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携手合作,共同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加公正、更富包容性的全球秩序,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一个具有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这一伟大实践为其他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借鉴,也为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富矿”。我们要遵循知识体系形成发展规律,扎实推进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在产业发展方面,我国形成了明确的发展思路,不仅有效指导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而且极大提升了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使我国成为世界工业大国和全球不可或缺的中心。产业经济学以“产业”为研究对象,立足我国产业发展实践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历史必然性。

从理论需求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经历了独特实践,包括从形成完备产业体系优势到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从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兴起起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不断提升等。这离不开我国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思路引导,包括:坚持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等等。西方产业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运行规律解释乏力,迫切需要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系统性、原创性的理论概括。

从时代要求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技术新动能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同时,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我国产业经济发展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效跃升的重要节点,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新的生产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等,才能更好指导我国产业经济发展实践,牢牢把握战略上的主动。

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首先从一些重点问题入手。这里列举几个方面。

探索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产业发展是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西方产业经济学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产业发展实践形成和发展的,其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遵循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自由市场竞争的逻辑,追求产业资本效率提升,缺乏对以产业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的整体考虑;跨国产业转移虽然极大提升了资本收益,却容易导致产业输出产业空心化、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我国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努力推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围绕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等我国产业发展实践,加强体系化阐释,形成基于我国经验的结构转型升级理论。

探索构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只有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才能有效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不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在全球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产业安全已经不仅是政策议题,而且成为一个重要学术命题。西方产业经济学从微观主体视角,主要关注市场机制下企业公平竞争问题,缺乏国家视角的产业发展理论。我国产业发展注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系统观念规划长远发展,形成了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时,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确保我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能够自主决策。总的看,我国在维护产业安全方面的实践具有独特理论价值。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识别与韧性评估、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的突破路径、产业转移与产业回流的驱动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界定与保护等,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经验系统化、学理化。

探索新技术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引领产业经济学新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从技术突破向产业渗透跃升;同时,碳达峰碳中和正在全球范围形成共识,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技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效率提升和路径选择,而是一场深层次的生产力革命,其作用和影响将超过前几次工业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技术发展处于世界前列。把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绿色发展等新技术新理念新要素融入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既是对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引领,也是推动中国产业经济学转型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制高点。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形成契合我国实际的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化理论概括,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丰富的理论资源。要坚持“两个结合”,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展现理论原创性。

比如,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特点。产业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应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产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推进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保障能源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等,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and 有效办法。要顺应产业发展新趋势,突破传统的产业经济学理论构建范式,积极吸收新科技革命、产业治理以及其他学科的创新理论,以融合创新推动中国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要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着力点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是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结构框架,决定了产业经济相关知识的组织方式与传承路径;学术体系是核心内容,包括认识产业发展的规律体系、基于规律性认识提炼出范畴体系、基于范畴累积及对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而形成的理论分析体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体系等;话语体系是表达方式和传播载体,决定了中国产业经济学在国内外的传播效果和国际影响力。这三者紧密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知识类型多样、理论范式科学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构建中国产业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史丹

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

周苒媛 聂平平

“迎检就是补台账,考核就是看本子”,这句基层一线的真实感慨,直击当前基层治理中文牍主义顽疾。实际工作中,有时真正消耗党员干部精力的不是攻坚克难本身,而是应付检查前突击“补台账”,迎接考核时反复“打磨”材料,落实政策时层层“留痕”。当工作的重心从做没做好偏离到写没写好,从实干担当滑向“文本包装”,文牍主义便悄然滋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更加重视评价工作实绩和发展实效”,这一重要要求,切中时弊、直指要害,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纠正文牍主义歪风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牍主义不是简单的“文山会海”,而是披上了制度化、精细化的外衣,呈现出三副“面孔”。其一,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在一些地方,汇报材料是

否装帧精美、台账是否厚实齐全,成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把精力花在“写”上而非“做”上,文字功夫取代了实干功夫。其二,层层留痕。凡事必留痕、处处必存档,党员干部的宝贵时间被淹没在表格、照片里,消耗在纸面应对中。其三,不论效果,只注重流程完整的繁琐程序。本可简化办理的的事项,被层层加码的审批、论证、评审所裹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

文牍主义看似态度认真、程序严谨,实质上让行政资源在“文来文往”中空转,党员干部精力在“纸面功夫”中虚耗,最终磨蚀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消解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而文牍主义却将党员干部困锁于“无谓的事务”中,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

文牍主义何以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的剖析一语中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问题不仅在“文牍”本身,更在支配“文牍”的行为逻辑。材料安全、台账齐备、汇报精彩,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就是“亮眼政绩”;只要材料过关,实际问题不解决可以暂且搁置。于是,材料出政绩的文牍主义逻辑得以运行。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是最终阅卷人。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评价标准是实效,而不是材料的长度、台账的厚度。凡是与工作实效脱节、与群众利益无关的繁文缛节,能减则减,该停就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必要的“痕迹”,更看沉甸甸的“实绩”;既看必要的台账记录,更看问题解决没解决、群众满意不

满意。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定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不不开解决问题的会,不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绩’的事”的重要要求落实到位,全面清理与工作实效无关的形式要求、重复报送、过度留痕。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担当实干作为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让脚踏实地、追求实效的干部有出彩的机会,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靠材料“包装”政绩的干部失去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文牍主义不等于不要材料、不要台账、不要程序。必要的记录是工作过程的客观反映,合理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不能让“材料”异化为文牍主义、“程序”退化为繁琐哲学,不能让形式主义吞没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而要让每一份文件都服务于解决问题、每一次会议都致力于推动工作、每一页台账都记录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